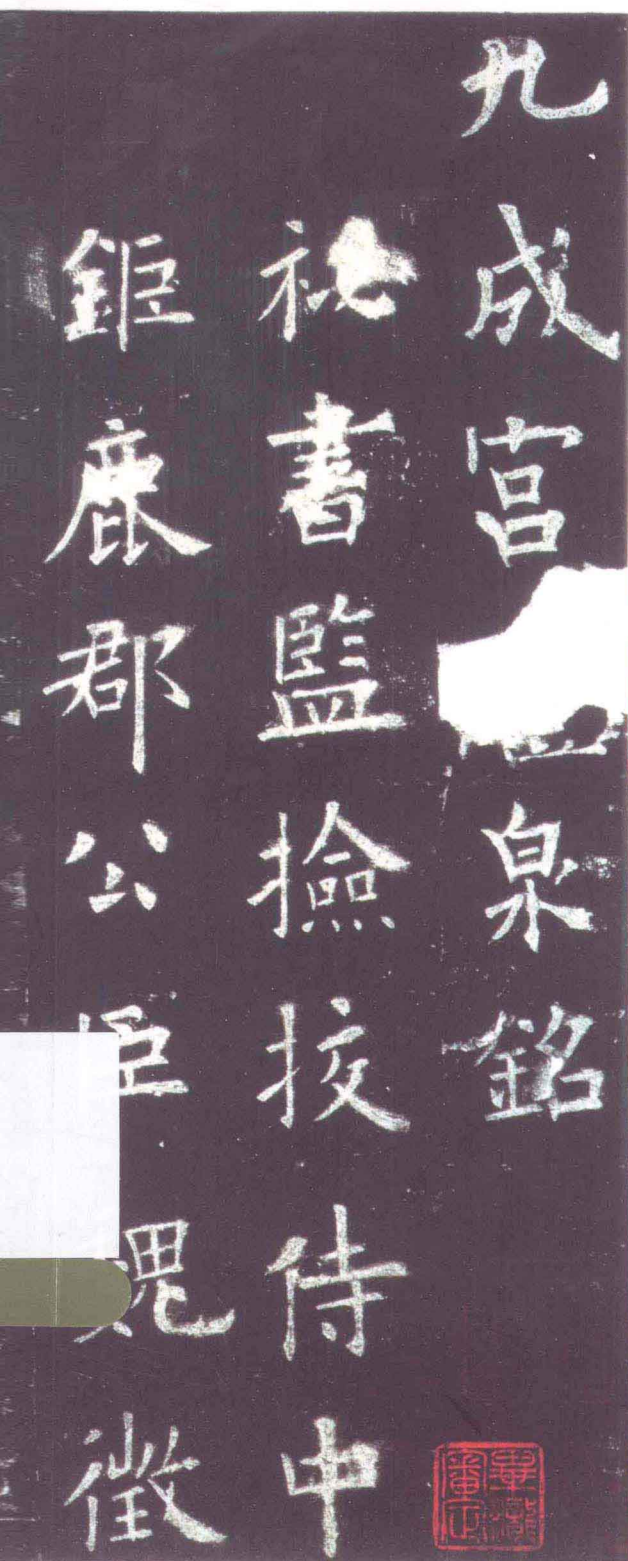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书法五千年

崔文华 著



中华书局

中国书法五千年

崔文华 著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书法五千年/崔文华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3.5

ISBN 978-7-101-09319-3

I. 中… II. 崔… III. 汉字-书法-中国 IV. J29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78368 号

书 名 中国书法五千年

著 者 崔文华

责任编辑 陈 虎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00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 19 $\frac{3}{4}$ 插页 2 字数 160 千字

印 数 1-10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9319-3

定 价 35.00 元



自序

中国书法的别样维度

一种文化现象总会具有两面性,乃至多面性,中国书法也不例外。但是,中国书法文化在电视片《中国书法五千年》中只作了“单向度”表现。也就是说,片子已经确立的主题指向,主要是表现书法的正面存在形态,而不涉及其他方面。作为电视片,由于种种原因或许需要这样。但作为书面阅读文本,则应该避免因过于美化而造成的误导。

从中国文字与书法的发生史上看,中国书法文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“官本位”传统,这是今人要特别警惕的。这个官本位传统,让中国书法文化并不总是那么美好,并不总是充满文化建设性的。

中国书法文化的“官本位”传统,与汉字发生史有着密切关系。

对于国家权力而言,文字的第一功能当然是强化国家统治,加强权力运作效率,知识功能与审美功能等等是要排在后面的。文字最初系统而持续的创制工作,一定是“有闲阶级”实施的。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原始时代,这样的有闲阶级一定身在统治阶层。文字产生之后的专业使用者,也必然是有闲阶级。底层劳动者,是“无暇”成为文字的专业使用者的。如果夏代和夏代之前,也有相对简单的符号在使用的话,它们一定



被酋长、部落长老、巫师所控制，用于当时的“社会管理”。

社会进一步文明化，进入商、周时代之后，文字依然被君主、贞人（宫廷占卜师）、贵族所垄断。商、周二代无疑是“学在官府”的，字作为“学”的最重要载体和工具，当然也就必然“字在官府”或“书（书法）在官府”。春秋战国时期固然出现过一段私人办学时期，但“官府之学”依然存在。这时候是教育的“双轨制”时代。

到了秦代，政府又上收并垄断了教育权，还是“学在官府”，尽管与此前“学在官府”具体形式不尽相同。

秦在文字管制方面超越前代的是，还特别制定了文字书写的国家标准体系，这是中国第一套明确实施的“字在官府”或“书（书法）在官府”制度。秦朝国祚短暂，不过留下的制度遗产颇为丰厚。

汉代不再坚持“学在官府”的国策，允许私人办学；但是在天下长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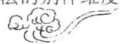


秦《峰山刻石》拓片（部分，北宋重刻）

政治大一统的稳定制度管理之下,教材由政府统一颁布,教学标准和人才录用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,以这套办法达到的国民教育效果,与“学在官府”时代没有什么本质不同。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之下,文字书写的国家标准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所以汉代不用颁布文字书写的国家标准体系,照样可以稳固地在全国内实现“书同文”。因为有更加坚实的政治制度和更加细致而深入的教育体制,保证了“字在官府”或“书(书法)在官府”,“书同文”成为深入人心的制度必然。

可以看到,早在中国文字萌芽和发育成长时代,“字在官府”或“书(书法)在官府”的传统就一直长久保持着。尽管各时期表现形态有所差异,但实质是一致的。文字作为国家政权运作所必需的重要工具,每一个字存在的合法性都必须得到国家认可的,其规范权都是由国家垄断的。文字架构规则的终极审批权属于国家,这是不容置疑的。历史上有过不少私人造字,最终都难以进入社会“流通”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“初造新字千余”、唐代武则天造字,都以朝廷诏令开道。

魏太武帝始光二年(425)诏书说:“今制定文字,世所用者,颁下远近,永为楷式。”(《魏书·世祖纪》)唐永昌元年十一月(689),武则天颁布《改元载初敕》,这时虽然她还没有代唐立周,但已经自称为朕,成为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。敕文说:“……朕宜以墨为名……特创制一十二字,率先百辟,上有依于古体,下有改于新文,庶保可久之基,方表还淳之意。”此前还有《武氏字海》的撰著与颁行,可见武则天新造文字或许不止“一十二字”。从两位具有强烈造字热情的最高统治者身上,都能看出权力对文字的创制欲和控制欲。他们都希望文字“永为楷式”、“保可久之



南北朝北魏楷书《张猛龙碑》拓片(部分)

基”。这些深谋远虑的掌权人，对文字的功能都有清醒认知，颁布新字有标榜新政权权威之用。当然，这两位创制新文字的君主由于个人原因，没有能够让这些新字持久使用。但他们的做法，表明了权力推行文字的力量。

在这样的传统中，帝王和政府官员有“师”的身份，是官方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和执行者，是正统文化资源的优势占有者和垄断者，是文字书写模式的示范者。例如秦朝政府首脑李斯的书体能够成为全国示范标准，就是制度化的必然。在这样的制度下，帝王和官员的书法被当作“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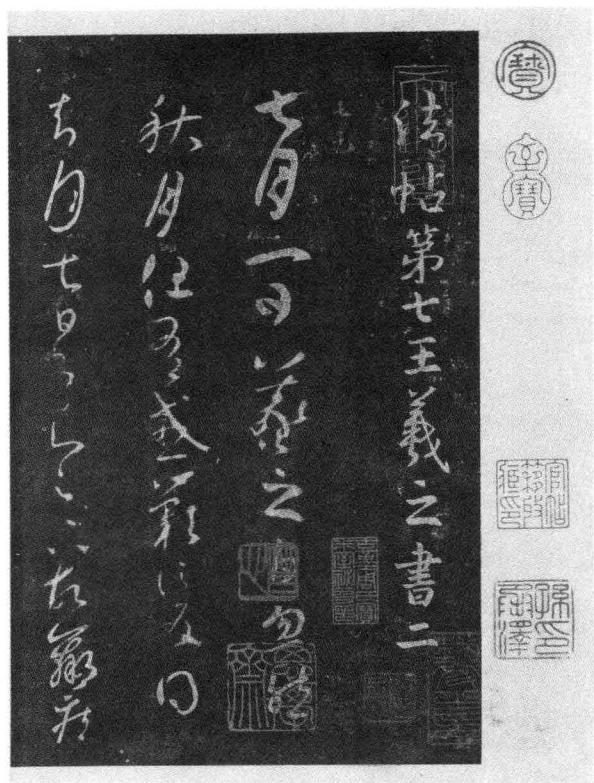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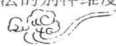
书”，被社会推崇和仿效，也是制度造就的专业优势。

在官本位体制中，哪些字能够用，写成什么样算“好看”，都由权力说了算。官本位书法体系，有自己的书法评价标准和游戏规则，并强有力地框定、制约着民间的社会选择评价体系。官、民两套评价体系，复杂地相互影响，也交集着矛盾。当然，官方评价标准始终占主导话语地位。

如果说，东汉之前，书法还是广义的文字书写之法，还主要是实用性的写字；那么，东汉开始，出现文字书写审美化创作的专门追求，个性艺术家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代专业书法家出现了。而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代艺术家意义上的书法家，绝大多数都有官方身份，这不是偶然的。其书法作品能够流传下来的书法家，就更需要官方身份的支撑。其中极少数没有官阶身份的书法家，也是因为特殊关系，得到了官方的特别关注和认可，其书法作品才得以流传。有一个最突出的例子表明，在官本位的书法传统中，书法作品流传对作者政治身份的依赖。

宋淳化三年(992)，宋太宗赵炅指令出版《淳化阁帖》十卷。收录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墨迹，包括 103 人的 420 篇书法作品，被后世誉为法帖之冠、丛帖始祖。《淳化阁帖》中的作者编排顺序，完全是按照“行政级别”排座次。第一卷专收历代帝王书法作品，二、三、四卷为历代名臣书法作品，第五卷是古代诸家法帖，后五卷为二王书法。

《淳化阁帖》之后，法帖刊行几乎成为书法作品流传的主要方式。而《淳化阁帖》按照政治身份等级编排书家作品收录顺序的体例，一直被官刻丛帖所沿袭，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。就因为这个编排体例，充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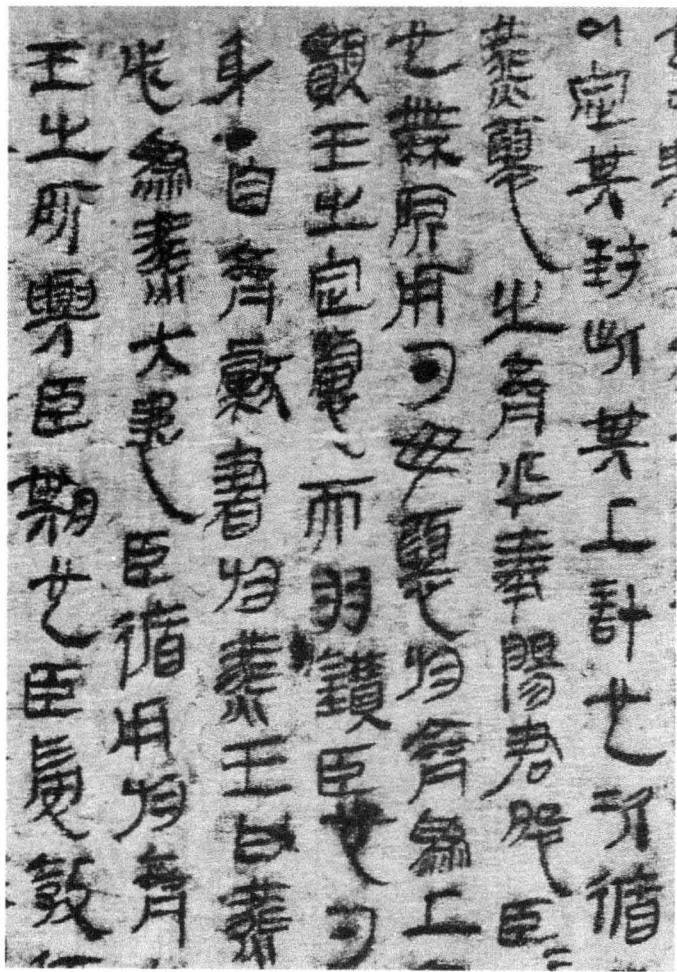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淳化阁帖》之《王羲之书二》(安思远藏本)

体现了中国书法的官本位精神,后续的编辑者自然觉得《淳化阁帖》开创的先例“顺理成章”、不容置疑。《淳化阁帖》开创法帖刊行编排体例之时,就有一个“制度文化”的思维定式;流传开去,更有制度模式的保障。

历史上那些书法技艺超群而又没有独立人格精神、更没有自主思想品格的书法人士,可以统称为“书法艺人”。在官本位的传统型社会,一个“书法艺人”如果一直生活于底层,长期创作于底层,不去打通与上流

社会的沟通渠道,他就基本不可能进入共时的书法主流视野,很难得到共时社会书法评价体系的关注,作品也就不可能在身后留传。



汉代民间书手抄写的帛书(部分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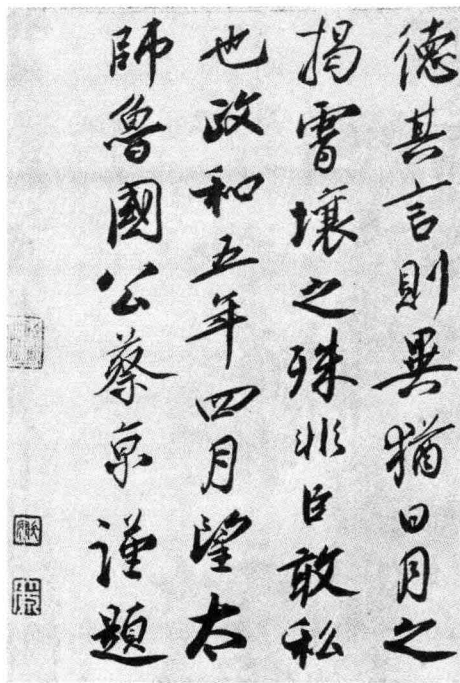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个“书法艺人”要想生前成名或身后传名，要么努力接近当官的，打通上流社会的渠道，力求得到高官的赏识、权力的肯定；要么自己想办法当官，“书法艺人”想通过写好字而获得官位，那是太难了。他们当中就算有几位靠“书技”而偶得官位，其实际地位也还属于倚技邀宠、弄笔撒娇的清客，不过是权门的点缀而已。

如果对历史上的“书法艺人”群落做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分析，就不难看到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，官本位体系内的官员位置毕竟有限，不是每个“书法艺人”都能够谋到一个官位的。而谋不到官位的“书法艺人”，又摆脱不掉对官位的艳羡，他们对官本位体系有一种割舍不掉的心理依赖，乃至生存方式上的实际依附。于是从这种依赖与依附中，就直接派生出奴婢心态、清客作风、谄媚人格。“书法艺人”总想把书法技艺变成对官本位体系的“近身”（也可以是“进身”或“晋身”）之阶，而现实中又绝少可能。这时，没有实际得到官位的许多“书法艺人”，还总是在官僚体系门下逡巡不离，甚至在其门下炫技乞食。偶得青睐，就会到处宣扬，内心深处充满了江湖艺人式的表现欲、争台戏子一样的虚荣心，不放过任何自我表现机会，甚至会不择手段地麇集官门而争宠。当官门都够不上的时候，“书法艺人”也会争宠于富豪之门，书法这时也就成为一种“游食”手段。历史上的“书法艺人”，有相当一部分其实属于游食群体，是文墨装扮起来的游民。专制社会条件下的游民，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劳动者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格形态。官本位传统一直严重败坏着中国书法文化的人格结构，无底线地贬损着中国书法文化的人本尊严。

中国书法史，一直强调书法家书格与人格的统一，以培育人格而提高

书格品位。实际上,这只是稀缺的理想状态。因为这种“书法体制”,就是以毁灭人格的方式建立的。能够保持人格的书法家,只有真正走到这个体制之外,才有可能实现书格与人格的统一。而这种体制像空气一样弥漫得无处不在,“走出去”要有“精神超人”的心理强度才行。没有理由要求所有书法艺人,都成为“精神超人”。做一个统计学上的分类就不难看到,高洁人格与卓越书格能够达成完美统一的书法家,绝对是极少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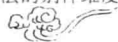


北宋蔡京的书法作品

“书法艺人”以技求官很难,书而优则仕的成功概率就算不等于零,也大致接近于零;适成对比的是,官员稍微练一下书法而成为“书法家”,那就容易得多。仕而优则书,至少大权在握时的成功率几乎百分之百。官员书法生前得到张扬的机会很多,身后流传的概率也较高。这是其占有的制度优势使然。统计学以量化的精确性,证明了权力与书法的关系。

在传统的官本位社会,书法是官员树立形象的重要手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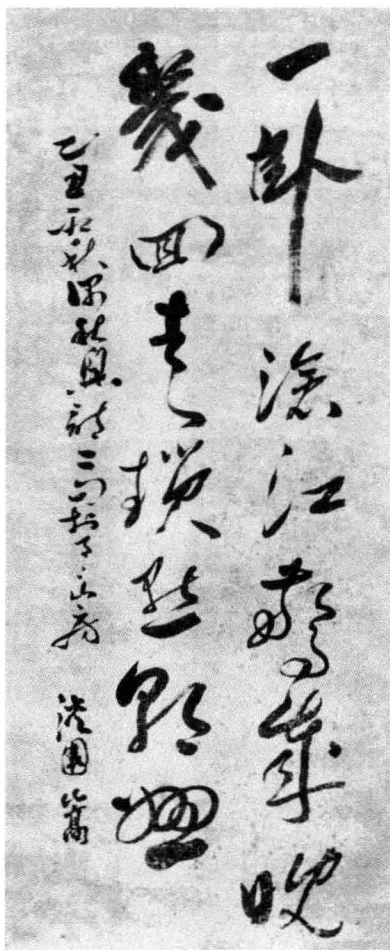
官员常喜欢用书法提高自己的“官格”。如果说政绩是树立官员个人形象的硬道理,那么,书法就是树立官员个人形象的“文化软实力”。



要树立完整的“官格”形象，就必须两手都要抓，从帝王到不入流的小吏，都懂得这个道理。

宋代奸相蔡京的书法，据说可称一代大师。蔡太师做到了权力与书法两手都在抓，而且两手都很硬。当然一旦倒台，也就一切都烟消云散了。蔡京大权在握时，很喜欢张扬自己的书法，现在有人见过蔡京的书碑题匾吗？两手比蔡京都软的诸多高官书法爱好者，就更不值一提了。

真正叫做无独有偶。明代奸相严嵩，据说也是书法高手。他会用自己的好书法，为嘉靖皇帝恭写青词。青词是由来已久的东西，唐代李肇《翰林志》记载：“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，用青藤朱字，谓之青词。”宋代程大昌的《演繁露》也说：“今世上自人主下至臣庶，用道家科仪奏事于天帝者，皆青藤纸朱字，名为青词绿章，即青词，谓以绿纸为表章也。”可知，青词就是把朱砂字写在青藤纸上的



明严嵩的书法立轴

道教拜神表文。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方术，青词大行其道。他无视民生疾

苦,只想求神延命。严嵩用自己的好书法写青词以邀宠,书法成为奸人弄权升官的利器。

历史统计表明,官格与书格完美统一于一身的人物属于凤毛麟角。几千年里,说来说去,还是那几个有限的榜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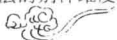


唐颜真卿《祭侄季明文稿》

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的“书法官”在权力膨胀欲的作用下,都对自己书法水平的判断严重失真,总以为自己是王羲之再世、颜真卿重生,是一代书坛领袖,正在开一代书风。因此都特别热衷于在公共空间里题词留字,如同到处留“情”一样到处留墨。尤其喜欢到名山胜景中题字,因此煞坏了许多风景。悬崖峭壁上刻字,也浪费了许多人力财力。这些都是书法的负面效应。流风余绪,断绝无日。

中国书法传统,不是一个单质存在,至少可以分成“清流”和“浊流”两部分。这两部分,其实都有现代延续。

十数年前,笔者曾为拍摄工作进入过一个封疆大吏的“书法工作室”。只见衙署大院内一个绿荫掩映的院中院精舍,百多平米的中厅摆



放一张硕大的实木书案，上有精美的文房四宝；几架多宝格布列壁下。大吏颇为矜矜于自己的书法造诣，其治下市县范围内，时常可见大吏的书额题匾。数年后，大吏毙命于反贪枪下，其诸多“传世”题字书法，也就很快荡然无存了。据说还有类似的当代大吏及其书法作品，也是这般命运，真是成也官本位，败也官本位。但是，这条路上总是后继有人的，因为支撑这种文化现象的体制还在。当然，留下的总比“走了”的多，所以这场竞逐还是可以赌下去的。

在历史上，书法还经常被用来制造权力神话。这也是书法与权力具有密切关系的传统使然，是书法作为权力运作有效工具的禀赋使然。《天发神讖碑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，此碑又名《天玺纪功碑》，传说为当时著名书法家皇象书写，但并无确证。

《天发神讖碑》立于三国时期东吴天玺元年(276)。



三国吴篆书《天发神讖碑》(部分，明拓整纸本)

这时三国东吴的孙皓，已经做了十几年吴主。此刻，割据小朝廷岌岌可危，但其最高掌权人并没有理智的危机感，孙皓日甚一日的残暴昏庸，导致政局危机不断加深。为了稳定局面，当时的官方策划人做了一个策划方案。可行性报告虽然没有流传下来，但呈现出的结果载于文献。说这一年东吴境内的临平湖边发现了一个石头盒子，里面有青白色的小石片，长四寸，宽二寸多，刻有“上作皇帝”等语，预言孙皓将成为一统天下的大皇帝。这被视为天降“神谶”，宣传机器立即把这件事渲染成重大祥瑞。于是国中大赦，改年号为“天玺”，并在一块很大的幢形石上铭文记事，这便是《天发神谶碑》，立于江宁（今江苏南京）天禧寺。

汉代谶纬之学大兴。谶原是方士编造的神秘隐语，假托神明之言而预言命运。纬是儒生把儒家经典神学化而附会解释天人感应关系的著作。谶纬之学对社会最有蛊惑力的部分，在于它对天子受命、改朝换代等未来政治走向做出的预言。到三国时代，谶纬学的影响还在。东吴的“天发神谶”，是这个传统的延续。

喜欢以天降祥瑞来为当下政治加分，是东吴政权的一个传统（当然许多朝代的政权都干过这类事）。孙皓的爷爷孙权就乐此不疲，他曾经以辖境内有黄龙、凤凰等祥瑞出现为借口而称帝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传》黄龙元年载：“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。夏四月，夏口、武昌并言黄龙、凤凰见。丙申，南郊即皇帝位。”如果说孙权当政时，本属客籍的孙氏集团入主江东，根基不深，还需要装神弄鬼来稳定人心，尚可理解。那么，到孙皓时代，东吴已历四主，还依靠这种办法提升自己的政治威望，那就不可救药了。